



卡洛斯·卡尔瓦略访谈综述——

农业转型与我们在有组织的城市社会中建立的意识相辅相成

亚尼娜·塞坦布里诺、盖布里埃拉·科戈为ROOTS撰稿

2025-04-23

农业工程师、教师兼研究员卡洛斯·卡尔瓦略(Carlos Carballo)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作为该大学农学系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其他人一起自200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该学校范围内推动粮食主权开放课程(Cátedra Libre de Soberanía Alimentaria)的设立。

为什么要设立粮食主权自由讲座？这一形式意味着什么，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

自由讲座这一形式是1918年阿根廷大学改革后被纳入大学章程的。当时的改革者认为，很多社会诉求以及科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进步没有被纳入大学的正式课程中。自由讲座(或者称开放讲座)便应运而生，旨在将社会中涌现的但尚未进入课程体系的议题引入大学。

第一个粮食主权自由讲座于2003年阿根廷经历严重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开设。我们直到2011年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开始自由讲座，其过程困难重重。自此之后



，医学院营养系也在学生会的努力下设立了自己的粮食主权讲座。如今这类讲座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已有**60**多个自由讲座，以不同程度的制度形式开展粮食主权问题研究，很多还涉及家庭农业、生态农业、社会、环境、营养学等其他相关主题。

自由讲座的参与者有哪些？

大学章程没有规定必须由哪些人组成，因此讲座组成各有不同。通常包括本校及外校的教师、毕业生和在校生，也有家庭农业组织、生产者组织、职工组织、消费者团体和环保团体的代表参与。这是一个民主、多元、跨领域的空间，并不像传统的大学讲座那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全国约有**500**至**600**人活跃在自由讲座网络中，每个讲座平均**15**至**20**人。这些人肩负责任，长期积极参与当地活动。此外，我们还与**10**个地方级、省级或国家级团体与组织合作，它们与自由讲座保持着长期的交流协作。

如何将讲座融入学生的学习周期？

每个讲座都会根据其在大学中的融入程度，以及发起团队认为最必要或最有利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开设策略。少数讲座会提供系统性的年度课程。这些是选修课，参加者修完后可获得学分。也有一些讲座允许非学生或教职工的社会人士参与，这些是开放讲座。然而，要在制度上获得认可并不容易。比如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就经历了这一辩论过程。

2012年，我们向学院理事会提交了开设自由讲座的提案。作为一门面向大学的课程，该提案很快获得了批准，适用的标准与其他课程相同。但当我们进一步提出希望社会组织代表、公平贸易生产者等其他社区成员也能作为学生参与时却遭到强烈反对。校方反对的理由是：“那样会拉低课程水平”。而对我们来说，这种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反问：如果不是那些在土地上亲身实践生态农业的人，谁还能带来这方面的声音？如果不是亲手构建社会经济的社区，谁能讲述这段经验与百姓的诉求？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中有谁能带来这样的声音？这并不会降低教学水平，反而是融合、促进和多元化。

在经历了一整年的激烈讨论之后，理事会最终批准了我们的提案。全国其他地区的讲座也纷纷采纳这一模式，且在审批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阻力较少。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就持续开设讲座，以线下形式授课，仅在新冠疫情期间改为线上。课程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参与式的教学模式：我们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必须前往走访、分析并反思一个关于粮食主权与生态农业建设的具体实践案例，并以此作为结课作业提交。



2024年参与式参观活动。

供图: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粮食主权公开课

粮食主权讲座的内容有哪些？

总体而言,尽管在内容上因地区多样性而有所差异,但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总是“如果不整体理解农业食品体系,就无法理解粮食问题,更无法理解粮食主权”。因此,我们会纳入与粮食的生产、加工和分配相关的内容。同时,还有一个我们非常重视并认为至关重要的维度:与饮食和营养相关的消费。这一点也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在那些位于大城市的规模较大的大学讲座中出现的次数尤其多。

阿根廷社会的城市化程度很高:90%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日益加深的城市化与工人组织和城市运动的历史相结合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集体为此奋斗的一个最有力的理念诞生了:土地改革与建立有组织的城市社会的意识密不可分。关于粮食与健康的讨论是我们社会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其中包括收入、就业、不充分就业、家庭组织、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动态、女性参与、家庭结构重组等议题。

您谈到粮食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然而在农学院,这个问题似乎离我们很远。您认为跨学科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这方面,与医学院自由讲座的同事们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将饮食、营养与健康这几个领域纳入了我们的课程。目前,我们课程的六门课中有两门由营养系的成员讲授。



去年,在其中一门课上,一位同学让我们全班人一起做饭。我们在学校食堂里开展了那次讲座,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砧板、围裙和厨具。我们一边做饭,一边展开讨论。这是我们课程中最有意义、最具感染力的实践之一。参与者在每项活动中都互相分享食物,这让他们得以亲身体验。我们每个人都带了食物来,向大家介绍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为什么带它来、其意义以及其烹饪过程。

我们围绕食物重新打造了一个交流空间,并花时间共同反思有关食物的问题。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谁生产了我们的食物?它们来自哪里?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都有名字:“这袋大米是某某组织生产的,具有这样那样的特点”,“这颗蔬菜是玛丽亚和她的家人用这样那样方式种植的。”

这样的体验使我们更加贴近农业生产系统,更加贴近农村生活,也让我们对农业群体的奋斗与诉求有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课程内容包括参与农村与城市的组织,以及学生自身的实践经验。
供图: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粮食主权公开课

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学是否能够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这一问题正被广泛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您认为粮食主权自由讲座能为未来成为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士的学生带来哪些帮助?

在我看来,参与粮食主权自由讲座的学生一般都已经具备某种程度的关注、动力和敏感度。这并不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多数教师和专业人士并不认同这种教学方法,无论是卫生保健领域、营养学,还是农业生产或技术相关领域,都是如此。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讲座引入的议题往往来自被边缘化的领域,是从边缘处发出的呐喊。能将这些议题、这些教师纳入到反思过程之中,对我们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即便是一门再有热情、再有深度的课程,也无法改变学生在此前受到的主流教育模式的影响。

正因如此,我们一直认为,必须把社区带入大学。仅靠现有的正式讲座是无法实现真正改革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在学院内部创办自由讲座。我们认为,多样的讲座听众、组织、基金会,规模不同、成员肤色也各异的协会的参与,比任何优秀的学术讨论更能推动结构性发展。



自由讲座聚集了许多致力于生态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者组织。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推广平台。这是一个由大约150位参与者组成的集体，他们定期举行集会，虽然意见不一，但始终充满活力、持续运转、自我维系与重构，在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都被认为是极具生命力的倡议。

我们坚信这是正确的道路。但仅有自由讲座还远远不够。我们亟需所有建设粮食主权的参与者在大学里积极、广泛、切实地参与进来。这不是靠演讲，而是要靠行动实现的。粮食主权自由讲座更说明了我们的边缘地位，我们是大学中的斗争空间，是众多斗争空间中的一个，肩负着与其他斗争空间联动的责任与承诺。这并非易事，但势在必行。



农学院举办的“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农产品直售会。
供图：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粮食主权公开课

您认为这些年来自由讲座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自由讲座是以网络形式运作的。从2022年开始，我们建立了一个全国协调机制，每个地区都有一位代表负责指导各项目标与战略。我们最主要的联动工具是《阿根廷粮食主权状况年度报告》。这个报告是我们三年来在各地联合多个社会行动者和组织自下而上共同撰写而成的。

我认为，该报告正体现了我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即我们赢得了来自各社会行动方和组织的广泛认可。我们通过努力使“粮食主权”这一概念与各地展开着的实践进程与斗争一起更多被人们看见。去年我们在胡胡伊国立大学发布了《粮食主权状况报告》。当时不仅有该校的校方代表出席，还有来自胡胡伊圣萨尔瓦多议会的支持。这种制度性的认可是我们所取得的又一成果。

从制度层面来看，我们确实有了一些进展。大学的领导出席了我们讲座的开幕仪式，我们提交了年度工作报告，我们开展的活动都有学院官方标识。我们有了自己的实体空间，我们的核心人物之一米里亚姆·戈尔班(Miriam Gorban)还获得了多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这些都表明我们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正式认可，但认可度仍需进一步提升。

我们必须把公立大学的角色置于辩论中心，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讲座正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探讨：公立大学如何为粮食议题提供知识、理解和投入？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回应如此重大的社会诉求？



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相信，只有依靠大学内部的社会运动，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这些目标；否则，我们注定无法完成使命。



阿根廷2023年粮食主权状况年度报告发布会。
供图：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粮食主权公开课

当前，全球农业食品体系和世界粮食生产方式正在经历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生态农业和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有机会为全球粮食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吗？

粮食问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它不是新问题，但却是一个极其严峻和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就如何解决百姓的粮食问题达成共识。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当然，这并非易事。

就阿根廷而言，目前的核心辩论是生产模式转型问题。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转型，才能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瓦解过去五六十年来在阿根廷形成的农业食品模式？在承认和促进小农农业和生态农业方面，阿根廷确实已取得制度上的进展。但自然资源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阿根廷的农业模式仍在朝着土地集中化和外国资本控制的方向发展。

大学、社会运动和政党中都有同仁们提出“土地改革是必由之路”。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实现土地改革？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最根本的一步就是向生态农业转型。城郊地区是斗争和讨论的中心，因为它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汇点，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衔接点。它们在数量、质量和组织层面上都必须进一步发展壮大。



展望未来，青年在自由讲座中参与度很高。您认为年轻人为这些讲座带来了什么，他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

年轻人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诉求和看待现实的方式。他们在这里有机会参与一个多元且民主的空间，这在大学中并不常见。在其他场合，他们甚至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而在这里，他们可以发言、提议、质疑、讨论。这为建设更具参与性的大学乃至这样的社会播下了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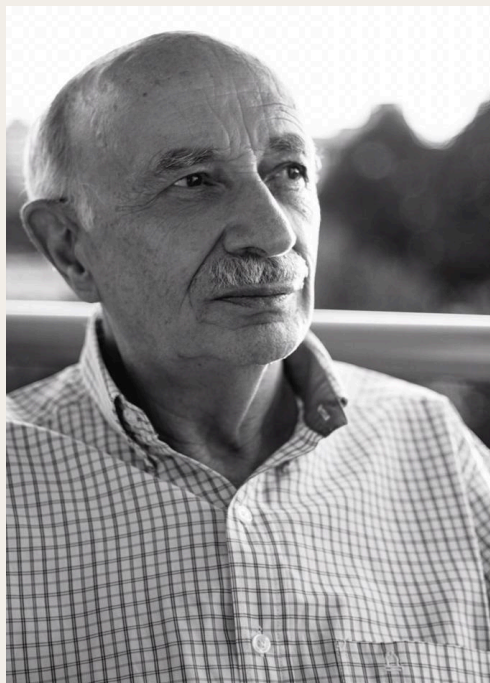
书本、大学或互联网的确可以给予他们一些知识，但那些在集体中能够切身感受、亲身经历、投身斗争、实际参与的东西，对于学习、理解以及社会参与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培养出真正的参与者，一个其核心作用应当在社会而非仅限于学术界的行动者。

显然，这与主流学院派的观点背道而驰，这也正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冲突点。但我认为，自由讲座是至关重要的。其汇聚了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年龄的学生群体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他们一起合作，共同学习生产与社区经验。这是一种集体建设，强化了组织联系。

未来你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致力于支持那些在阿根廷以及整个拉丁美洲不同地区为粮食主权议题奋斗的人们。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份小小贡献。

但是，我们需要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在大学中的持续参与。唯有如此，大学才能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提供相应的知识与贡献。这是我们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



卡洛斯卡尔瓦略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农业工程师，“粮食主权”开放课程的创始人及代表人物。

供图：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粮食主权公开课